



五四运动 回忆录

五四运动回忆录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

中华書局

五四运动回忆录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

*

中华書局出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8 1/2 · 插頁2 · 字數161,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 定价(五)0.67元

統一書号11018·138

編者說明

这本回忆录，一部分是曾經在报刊上發表过的，共23篇；另一部分是沒有發表过的特約稿和訪問記錄（只限于回忆录），共18篇，字数則約全書的一半。

这些稿件，都由当时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人所講所写，比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运动的一些重要方面，对于人們要求更好的了解五四的历史意义，和寻找新的資料进行科学研究，都能够有所帮助。

稿件是按照五四运动的醞釀爆發、这一运动在全国各地的發展、先进知識分子在五四时期的作用等順序加以編排的。这样做的缺点是前后有些重复，不象一本历史書那样严格照历史过程叙述，好处則是保持了每篇稿件的完整性，檢閱方便。我們想，編回忆录和写書的要求有所不同，这样做也許还比較适当一些。

在編輯方面，我們作了以下工作：

(1)刪节了一些不必要的內容。如过去發表的回忆录

中，屬於紀念性的文字，訪問記錄中，同五四關係較少的部分等。

(2)對部分稿件更換了標題。原稿多用“回憶”、“追憶”作標題，我們為了突出這些稿件的內容，作了部分的更動。

(3)大部分稿件均經本人修改過。有些篇，我們還作了一些文字潤飾工作，但力求符合原稿的意思。有些地方雖嫌欠妥，因不便改動，亦仍維持原狀。

有些稿件在個別具體事件的敘述上，情節、時間有出入，我們沒有進一步去核對。

因為時間倉促，約稿有困難，特別由於編者工作能力限制，編輯上有許多缺點，請予批評、指正。

目 录

編者說明	(1)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吳玉章 (1)
五四回忆	許德珩 (23)
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王統照 (32)
回忆五四当年	孙伏园 (43)
回忆五四	楊振声 (52)
五四期間北京第三次請願活动的回忆	張靜虛 (58)
北京高师参加五四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	于 力 (65)
五四杂忆	楊 晦 (70)
前事不忘	郑振鐸 (77)
北京大学工友回忆五四	《北大半月刊》編者 (80)
長辛店学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	何長工 (82)
五四运动的回忆	鄧演超 (85)

五四回忆·····	刘清扬(94)
漫話五四当年·····	鄧穎超(97)
我对五四前后天津学生运动的几点回忆·····	刘清扬(102)
五四期間上海海員工人的罢工·····	朱宝庭(112)
六三以后上海工人的大罢工·····	鄧中夏(115)
五四前后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	延波真(118)
五四时期山东各界的爱国运动·····	黄秀珍(122)
五四时期的安徽学生运动·····	周新民(126)
五四期間的武汉学生运动·····	楊松(140)
五四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張浩(142)
五四的浪花·····	夏之栩(148)
湖南桃源女子二师在五四时的爱国活动·····	王一知(156)
五四前后·····	傅彬然(159)
五四在杭州·····	施复亮(173)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	張秀熟(177)
五四的浪花·····	艾蕪(198)
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活动·····	顧仲素(207)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釗同志·····	高一涵(211)
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是誰领导革命?·····	高一涵(215)
孙中山先生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許德珩(219)
回忆五四运动中的魯迅先生·····	孫伏园(221)
回忆五四时期的方志敏同志·····	廖敏(224)
关于五四运动和邓中夏同志几点回忆·····	楊東專(235)

回忆四十年前的战斗英雄馬駿烈士·····	刘清揚(234)
五四期間的郭隆眞同志·····	刘清揚(248)
杂談五四·····	許德珩(250)
談少年中国学会·····	周太玄(257)
五四运动期間的少年中国学会·····	川島(260)
五四与妇女解放运动·····	陈素(263)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吳玉章

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1913年7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悔从前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

我們还想憑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产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軍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氏違法乱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軍事行动上，結果，在袁世凱的强大軍事压力下，起义好像曇花一現而失敗。仅存在南方几省內的一点革命軍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

起义失敗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認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凱的統治是不会長久的，所以想隱蔽在上海，繼續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凱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說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緝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1913年11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悶。“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軍閥攆到了外国，革命失敗得真是再慘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燒起来，把丑恶的軍閥統治燒个干干淨淨。1914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能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發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凱还修改了民元約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終身大总统，許多北洋派爪牙也紛紛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凱气焰囂張，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讀書。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門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畢業，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1911年畢業，未

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从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

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魯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張，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組織革命团体的主張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沒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們並沒有給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二、軍閥腐朽統治的一个实例

1914年以后，中国的政局發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出兵山东，并向袁世凱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袁世凱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接受了这些条件，秘密地签了字。1915年底袁世凱假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而公然称帝。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时候，反对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来。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軍首先起义，各地紛紛响应，袁世凱的皇冠不久就滾落在塵埃里。1916年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活活地气死了。

袁世凱統治垮台，对我的通緝令自然失效。随后，南北和議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長，我就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1917年2月我到达北京。我到北京有一个任务，因为欧洲大战开始以后，法国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华工，袁世凱政府和法国訂立了一个关于招募华工的条約，內容对中国工人非常不利，經手人梁士詒从中捞了很多錢，根

本不顧工人的利益。这时候我們已在法国組織了华法教育會，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到法国去的大批華工中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貧苦学生能出来留学，还組織了勤工儉學會。由于袁世凱政府与法国所訂的条約对工人很不利，我們出来力爭，費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訂条約。規定中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們爭回了一些权利。我就携带这个条約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还像从前一样。袁世凱虽然死了，但是北洋軍閥繼承着袁氏的衣鉢，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爭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貪污腐敗風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約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4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識的人来訪問我，他問我：“听說你帶回一个招募華工赴法的条約，批准了沒有？”我說：“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詳細地給他解釋了这个条約比前一个条約要好的多。他說：“你沒有在北京住过嗎？你是學生嗎？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錢不行。如果有錢，再坏的条約也能批准。如果沒有錢，再好的条約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賺几百万，你就是拿一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說：“我們就是为了反对賺工人的血汗錢，才辛辛苦苦爭回了一些权利。我們沒有錢，不但不願拿錢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錢来运动我也不行！”說着說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時說“你执拗得很，讓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是

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長派來的。在軍閥官僚統治下，什麼好事也辦不成，不鏟除軍閥統治和官僚制度，中國決無得救的希望。這是我的一次嚴重教訓，我立志要和惡勢力鬥一鬥。當時我沒有任何其他辦法，還幻想通過個人關係去說服外交部長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個同盟會員，總不會和貪污官僚一樣。他身為外交部長，是會有批准條約的權力的。那里知道，官僚機構，重重疊疊，相互牽制，伍廷芳雖然答應批准條約，可是外交部內上上下下的官僚們都想撈一點油水，仍舊拖延不動，事情就這樣拖下去，沒有得到結果。

我這時一面在交涉條約的事情，一面又進行第二個任務，就是辦留法勤工儉學，設立了一個留法預備學校，同時又給四川同事去信請他們也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分會。1918年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傳到了湖南以後，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潮。我們希望在這個動亂的環境中能夠培養出一些人才。但是這時我目睹國內的混亂和腐敗，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証明，在軍閥統治下，連教育工作也不會讓你安定地做下去。這時北洋軍閥正在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總統黎元洪和國會議員站在一邊，背後有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多數省份的督軍站在另一邊，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之間圍繞着對德宣戰問題，展開了勾心鬥角。段祺瑞唆使督軍團包圍國會，脅迫黎元洪一定要通過對德參戰案，以便借此機會，大借外債，擴充實力；

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勾引頑固派張勳进京。其实張勳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6月張勳进了北京，就搞了一出“宣統复辟”的丑剧。当时，北京城内，兵荒馬乱，到处搶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稍有点关系的人都紛紛避难出京，我也只得暂时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随后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張勳，独攬政权。这时辛亥革命所遺留下来的“民元約法”被軍閥完全撕毀了。南方为了护法，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成立了軍政府，于是出現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

三、“南与北一丘之貉”

1917年7月，伍廷芳和海軍部長程璧光率領海軍南下，孙中山先生也到了广州，主張“护法”，在广州組織軍政府，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对抗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1917年年底熊克武驅逐了刘存厚，統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参加軍政府，我于1918年2月到广州見了中山先生，隨即又回北京把所負華法教育会的工作进行了交待，6月才去广州任职。原来軍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滇系軍閥的力量，我們当时以为滇桂軍閥与北洋軍閥有矛盾，可以利用他們来为革命服务，而且他們实力較小，不像北洋軍閥那样跋扈难制，有可能团結他們，使他們服从中山先生的領導。不久就証明，这种想法是十分錯誤的。軍政府成立后，野心勃勃的桂系軍閥陆荣廷、莫荣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軍

閥勾結，并且跟我們大鬧幕后摩擦。軍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終于被排擠，1918年5月由廣州回到上海。他在辭職通電中痛斥桂系軍閥說：“南與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這時真是傷心忿恨到極點了。

當1918年6月我再到廣州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已經到上海去了。7月間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為七總裁之一，我當時曾到上海勸中山先生就職，他未同意，我又勸他可派代表去應付，他答應了。我們當時仍想團結各方面的力量來抵制桂系，以圖補救大局於萬一。我們所能團結的力量有南下的國會議員和海軍，有各省軍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部隊——陳炯明所統率的粵軍，還有廣東的一些地方派軍人。桂系特別把陳炯明部視作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消滅它，陳炯明部被迫退駐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粵，情形很危險。這時軍政府內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們揭露桂系和北洋軍閥勾結的事實，反對桂系排擠粵軍，極力保全陳炯明部。在會議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學系政客爭吵起來。桂系軍閥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換我的代表職務，到了1919年他們策劃成南北和議時，我就不再當代表了。

參加護法，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中山先生所說“南與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們當時苦心孤詣所要保全的陳炯明又何嘗不是與南北軍閥同屬“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後，陳炯明利用國民黨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驅逐桂系，重返廣州，並且隨後又背叛了中山先生。這個叛徒要知道

当时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們又如何竭力保护他，他真应该惭愧而死。在当时军队是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們的統帥，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們也沒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圖爭取有实力的統帥。从辛亥革命起，我們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凱，后来为了反对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們要从头做起。但是我們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們心中的迫切問題，这些問題时刻攪扰着我，使我十分煩悶和苦恼。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給我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剛發生的时候，1918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鎖消息，我們还不知道俄国已發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紀元的偉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長期被封鎖住的，后来我就讀到了約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們北方邻国已經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偉大的俄国人民已經摆脱了剝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實現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